

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去行政化、高校自主权和招生改革,南科大最初的改革正是抓住了这三个核心问题,才赢得了大家的赞许,而最后也正是由于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处理不当,才使得人们如此失望。

南科大,一道高教改革“是非题”

■本报记者 陈彬



图片来源:南方科技大学

不久前,南方科技大学2014年自主招生能力测试正式举行,超过3000名考生走进了考场。他们中间注定会有人在几个月后,迈进南科大的校门。只不过那时的南科大可能已经“换了天地”——南科大首任校长朱清时届时可能已经离任。

从2009年接过南科大校长的聘书至今,5年的时间里,朱清时和他治下的南科大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太多话题与争论。一直以来,国人眼中的南科大都是高教改革的“试验田”,如今,五年春秋已逝,这块试验田收获的除了改革成果,恐怕最多的依然是“是”与“非”的无尽争论。

关于成绩——接近成功 or 已经失败

“南方科技大学”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07年。那一年,在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筹建南方科技大学”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直到2009年朱清时入主南科大后,这所“新式”高校才正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改革之路。

“南科大刚开始建立的初衷是模仿香港科技大学,通过在制度层面的彻底改革,短时间成为高水平研究性大学,而这其实正是国内几乎所有关心高教界人士的共同愿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顾也力如此表示。

“深圳创办新学校,按照新机制和新体制来办学,就可能实现我的梦想。这对我是一个挑战,我愿意迎接这个挑战,为高校改革的突破搏一搏。”在刚刚接手南科大时,朱清时曾满怀希望。然而,希望并不等于现实。

从南科大成立之日起,顾也力便一直关注着它的每一步发展,曾经他也对这所学校充满期待。但几年时间下来,他投向南科大的目光里,“期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失望。

“没有什么成果,”顾也力直言,南科大改革最让人期待的是去行政化、对高校自主权的争取,以及对自主招生体系的完善。然而从实践上看,南科大五年的“改革”之路,更像是对政府现行体制的“妥协”之路。“目前,南科大无论从内部架构还是招生方式,都已经被划到了‘体制内’,这也标志着南科大改革的失败。”

顾也力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总体态度,即此次改革更像是一场闹剧。但也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悲观。比如在采访中,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便坦言,对于南科大,很多人太苛求了。

“无论如何,朱校长和南科大都是高等教育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能够找到一批有识之士,将这所学校办起来,本身就已经接近成功了。”唐安国表示,南科大近几年充满斗争与妥协的发展之路,其实已经在原本僵化的教育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我们不能否认南科大改革存在诸多问题,但更需要看到,自南科大之后,包括上海科大在内的一批新式高校正在出现,国家层面也在进行更多的改革尝试,谁又能说这中间没有南科大改革的刺激呢?”唐安国说。

“去行政化是一个梦,我给自己打分是做到了及格。”这句话出自于朱清时本人,也可以算作

他本人对于南科大改革成败的一种评价。而对于唐安国所说的“刺激作用”,作为校长的朱清时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例如对于南科大在招生方式的创新,他就曾坦言,自南科大作出改革后,已经有五六所高校效仿,这让他“很受鼓舞”。

关于妥协——决策失误 or 政府小气

无论对于南科大改革本身功过如何评价,有一点是几乎所有人的共识,那就是在改革过程中,朱清时和他的南科大有着太多的“妥协”与无奈。

以招生方式为例,建校之初,南科大设定的招生方案为“4+3+3”模式,即高考成绩占40%,平时成绩占30%,能力测试成绩占30%。但最终这一模式变成了“6+1+3”,高考成绩所占比重被大幅提升,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对现行考试模式的回归。至于南科大对行政级别的“定位”,更是引起很多人的口诛笔伐。

对此,朱清时曾作过解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打过这样的比方:“我们爬山会找阻力最小的路上去,走直线会很困难。我们只是选择困难小点的路走。”

无论是妥协还是智慧,对于这种改变产生的原因,不同的人有着不同解读。

比如,在采访中,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便将其看成自身战略失误的必然结果。“从道理上说,南科大的追求没有错,但这种追求已经超越了现实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环境的许可,这就导致南科大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学校要生存下去,也就只能妥协了。”

别敦荣表示,在这方面有很多事例,比如,对于行政级别的摈弃,虽然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现阶段却太缺乏可操作性,与现行体制更是格格不入。“把自身和教育部放到对立面,理想是对的,但在操作上却犯了战略性错误。”

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犯错误”的并不是南科大,而是现行体制。

“南科大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不‘超前’,

每一项制度也都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既然如此,该改变的就不应该是南科大本身,而是教育主管部门。”顾也力说。

在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顾也力曾直接向教育部领导提议,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曾经在体制层面享受了太多宽容。如今身处经济特区的南科大,也应享受这种宽容的体制环境。“但直到今天,南科大身上的束缚依然不见减少。”

拿深圳特区举例的并不止顾也力一人。“深圳刚刚建立特区时,政府开了多大的‘口子’?为什么在南科大身上,政府就不能管松一点?”采访中,唐安国也表示,改革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不能“齐步走”。“政府没有允许高校在少数点上进行突破,这种制度压力本不该由南科大承担。”

关于影响——改革“孤岛”or 影响已成

很显然,南科大这个高教改革“特区”没有得到足够的政策扶植,而它产生的影响也远没有脚下这片土地对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影响深远。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南科大的改革轰轰烈烈持续了多年,但放眼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响应者寥寥无几,大家似乎都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这所学校与体制之间的争斗与妥协,以至于某高校老师在自己的博文中曾作出这样评价——南科大在裸奔,朱清时很孤独。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措施是南科大提出后,在全国得到推行的,也没有出现南科大提出诉求后,其他学校跟进的情况发生。南科大的诉求都是他自身的诉求,并不具有普遍性。”别敦荣的一席话,很好地代表了南科大目前的处境。

朱清时确实很孤独,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顾也力给出的回答是:“首先南科大自身改革在实施过程中毫无亮点,导致其他高校即使有心相助,也缺乏‘抓手’;其次,国内大多数高校在多年形成的巨大体制惯性之下,也缺乏与之相呼应的动力,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来自

于教育主管部门长期以来‘家长’式的管理……”

“这三者彼此‘呼应’,谁都难逃干系。”顾也力说。朱清时的孤独是否意味着这五年改革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没有产生影响?

“若干年前,当深圳特区建立时,也曾引起举国震动。但时至今日,它的发展对国内经济形势还能产生多大影响?”唐安国说,“任何一项改革的影响都不会持续,南科大通过在固有体制面前‘揭竿而起’,其影响已经形成,至于最终改革成败,那是另一个问题。”

“不管南科大走到哪一步,不管朱清时是成功了,还是因为多种原因失败了,南科大的价值已经体现了。”在两年前的一次采访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关于未来——原地踏步 or 谨慎求索

在有关“影响”的话题上,别敦荣谈到了自己的担心:“南科大改革的困境,其实有可能给之后的改革者造成一种负面影响——原来改革如此艰难,我们还是算了吧。”

对此,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原南科大筹备办副主任韩蔚曾经有过类似表述。

不过,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改革依然是大势所趋。既然如此,仅就改革的本身而言,南科大能给未来“不惧阻力”的改革者们哪些启示呢?

“先进的理念、理想的模式应该怎样付诸实施,如何与政府行政体制相融合,使政府行政体制认同这些理念和理想模式,并从中汲取有用元素进行推广、普及,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南科大的探索应该取得很好的经验,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对着肯定不是最佳选择,可以说,在这方面南科大太缺少智慧了。”别敦荣说。“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去行政化、高校自主权和招生改革,南科大最初改革正是抓住了这三个核心问题,才赢得了大家的赞许,而最后也正是由于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处理不当,才使得人们如此失望。”顾也力说。

似乎只要涉及南科大,即使是在讨论未来的发展,人们也免不了将落脚点放在有些尴尬的现实上,这也从某种角度印证了别敦荣和韩蔚的担心。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学者不忘提醒人们“保持乐观”。比如,在大家纷纷对南科大表达失望之情时,就曾有人在网上直言:“只要实践,即使仅仅是从此零到一,也是一种进步,但如果不去改革,我们便只能原地踏步。”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使命,乃至南科大的使命,朱清时都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曾坦言,南科大的教改实验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不可能单由南科大一个学校从头走到底。“南科大的历史使命就是先宣传和弘扬‘去行政化’的理念,不一定非得是南科大最后去行政化成功。这个理念一旦在社会上形成共鸣,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做。”

希望真如朱清时所言,无论南科大的改革是否成功,后来的继承者队伍都能够越聚越多。也许只有那时,才能如他所愿,“再过二十年,中国的教育已经在走南科大的路了,我们成了先行者……”

中国大学评论

随着高等教育的持续大规模扩展,高校毕业生的增量每年攀升,几乎每年都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因此有学者认为为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应该鼓励毕业生进行自主创业,以缓解就业矛盾。然而,自主创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和市场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为零的高校毕业生而言。

很多调查显示,高校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并不大,而且即使选择了自主创业,能获得成功的比例更是小之又小。比如,2011年,一份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5%左右的高校毕业生有创业意向,而且这还是让毕业生可以有多个就业意向的结果。2004年教育部一项关于学生创业企业的跟踪调研报告显示,在近100家学生创业企业中,5年后继续运营的不到1/3,赢利的不到1/5;而另两项调查的结果更为悲观,200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2%~3%,远低于一般企业;零点公司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0.01%。看来,让较大比例的高校毕业生创业获得成功,进而缓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目前可能还只能是理念上的设想,远远没有成为一个事实。

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按照创业驱动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毕业生是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不得不选择自主创业,这种类型的自主创业称为被动型自主创业。还有一类毕业生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的“被创业”,而是已经有想成为企业家的想法与抱负,对某一领域、产业已经有创意理念的主动创业,称之为“主动型自主创业”。相对而言,被动型自主创业缓解就业难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被动型自主创业往往局限于解决自身的生计问题,而且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主动型自主创业却能联合更多毕业生一起参与创业,给毕业生以及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见,为了让毕业生创业真的能够缓解就业难题,高校与相关政府部门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毕业生采取不同的支持与扶持策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般而言,主动型自主创业比被动型自主创业的要求更高,创业门槛也更高,需要得到的扶持更大、更完备。如果没有对创业毕业生“扶上马,送一程”的持续关注与扶持,毕业生即使有强烈的创业想法,往往也可能会担心创业失败而一一开始就放弃创业计划。

笔者与同事前段时间以硕士毕业生为样本,专门研究了怎样的毕业生群体会有主动创业的意向,我们发现,那些给予大学生创业以更大落户自由度以及持续融资服务的城市,它们的毕业生更有可能怀有主动创业的意向。而那些对大学生创业优惠措施有更严格户籍限制的城市,它们的毕业生主动创业的概率明显更小。

如果没有坚定、明确自主创业的意向,没有经验、没有阅历的青年毕业生的创业很有可能会成为“戛然而止”的仓促上阵。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青年毕业生也很快就被打下阵来,灰心丧气地成为待业青年。这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的就业难题。所以,鼓励高校毕业生创业,更应该从培育他们的主动创业出发,让他们建立起成功的创业信心。

除了各级政府要通过创造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促成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外,高校在这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更加不能“缺位”,因为高校才是能够给毕业生的创业提供技术、创意与团队的基础所在,高校才是培育、激发毕业生创业最好的土壤。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创业团队都是师生、同学或者校友作为搭档齐上阵,比如微软、搜狐、新东方等。这是因为,师生、同学与校友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是志同道合者或是彼此知根知底,一旦机会来了,就自然组成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团队。这些著名的创业团队不一定是刚毕业就走到一起创业,但是大学期间共同学习与生活的经历,让经过市场磨炼的他们在若干年后很容易地自动重新聚集,做一番事业。

因此,高校除了需要鼓励自己学生的单打独干进行创业外,还更应该有策略地培育、打造创业团队;这样即使他们毕业后不会马上选择创业,但却又如培育了一颗颗创业的种子,一旦风起云涌,这些创业种子就会结合起来,发育成参天大树甚至聚成森林。高校的这种培育“主动型”创业的创业观就比单纯为了解决毕业生就业难而让毕业生“被创业”、增加就业率的创业观更为远大,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这才符合高校育人之本的精神。

总之,无论是社会还是高校,对毕业生创业应该是在根本上培育他们创业的理念、促成他们主动地创业,而非由于担心毕业生就业率低而想着通过让学生毕业前的暂时“被动就業”“甩包袱”。如果高校真的抱着“甩包袱”这样的心态促成毕业生就业,毕业生可能很快就会遭遇创业失败、成为待业青年,进而产生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大连理工的科研“三字经”

■本报记者 陈彬

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科研作为核心工作之一,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对国内众多以理工起家的高校更是如此,大连理工大学便是这类高校的代表。多年以来,这所与共和国同龄的大学,在科研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

据统计,2006年以来,该校作为首席单位获得“973”项目9项,承担和参与“973”课题105项,还承担和参与了国家9个重大专项中75项科研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也连年跻身全国前20名。2006~2013年,大连理工大学共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28项。其中在2008年,该校更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实现了辽宁省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在科研领域,大连理工大学又有怎样的实践与思考呢?

上顶天:政策保证下的“尖端突破”

今年3月底,备受国人关注的港珠澳大桥施工现场传来喜讯——大桥岛隧工程E10管节顺利完成,管节浮运成功安装。至此,港珠澳大桥已安装沉管隧道突破1600米。

作为世界上设计跨海距离最长的桥隧组合公路,港珠澳大桥对港澳和珠江三角洲两岸地区的经济发展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座远在南海的大桥,却与位于渤海之滨的大连理工大学有着密切联系。

原来,自2012年开始,由该校牵头成立的“工程防灾减灾协同创新中心”,便启动了对港珠澳大桥的健康检测项目,该检测系统也成为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健康监测系统。而港珠澳大桥的事例,也只是大连理工大学近年来众多尖端科研项目的一个代表。

下立地:体制探索中的“魔方效应”

作为辽宁省唯一的两所“985工程”大学之一,长期以来,大连理工大学的各项工作与地方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科技工作也不能例外。于是,在“顶天”的同时,该校也不忘“立地”。在这方面,大连理工大学也有着自己一段“故事”。

故事开始于2005年。这一年,时任大连理工大学副校长郭东明在该校合作的工作中发现,原有合作模式存在某些机制问题,便与多年合作的沈阳鼓风集团一起,创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沈鼓一大工研究院。

这个研究院更像是一个特区,高校科研人员

不考核工作量,而是直接面向企业解决技术困难,企业在向他们提供课题的同时,给予适当待遇。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更容易把老师当作“自己人”。行业龙头企业技术需求也代表了国家的技术需求,更容易锻造出一批专家。

新模式一经推出,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后该校又与企业合作,建立了多个类似机构。通过改良原有模式,该校还在长三角地区成立了常州一大工研究院等一批新模式研究院。

据了解,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构建了包括1个重大装备制造共性技术平台及4个专用技术研究院的协同创新格局。其中,4个专用研究院直接对接4家国内龙头企业,为他们解决最实际的工程问题。“这样的布局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做大型压缩机叶轮气片表面设计方面的14项关键技术中,有4项便直接来自协同创新中心。”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王永青如是说,这种校企对接的直接效果就是,我们在很多重大设备的研发和生产上,有了当面和国外产品“叫板”的资本。

近两年,该中心还结合国家的体制改革,在辽宁省科技厅的支持下,策划了辽宁省创新体系的构架蓝图,并建议辽宁省出台专门支持重大装备的重大专项。目前,该专项已经启动了第二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都发源于几年前‘沈鼓一大工研究院’的体制探索。这就像一个魔方,在不断变化中,催生出如此繁多的体制、机制创新,而这种变化的直接受益者,便是我们的企业和地方经济。”大连理工大学科研技术研究院

高新部负责人说。

中树人:科技探索时的“工作准则”

当然,作为高校,一切工作的重心还在于人才培养。于是,如何在科技创新的同时,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成为了学校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2012年夏天,一门名为“结构动力学基础”的课程亮相大连理工大学的小学期课堂,随即引起了学生的广泛兴趣。因为这门课程的主讲人并不是本校教授,而是来自于美国土木工程排名第一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首席教授斯宾塞。

邀请斯宾塞来华授课的,正是之前提到的工程防灾减灾协同创新中心。“这不是一般的‘讲座’性质,而是真正在学校教授一门课程。”何政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们在享受到高质量的课堂教育。同时,初尝美式教育的学生也更能理解隐藏在美国大学教授课程下需要付出的那份努力。“据我所知,这种形式在国内高校中并不多见。”

事实上,对于大连理工大学的相关单位而言,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兼顾学生培养。

以辽宁重大装备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为例,为解决辽宁省协同企业对于高端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大连理工大学曾与英语强化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全面改革。更是在2012年开设了全英文四年制机械工程国际班,而这一国际班便交由该中心管理。为培养好这批学生,中心保证每年不少于5门课程由海外知名大学教授授课,还开展了与20多所国外大学的交换生项目,还实施了外派本科生至3个协同企业海外研发中心进行短期实习培训的计划。